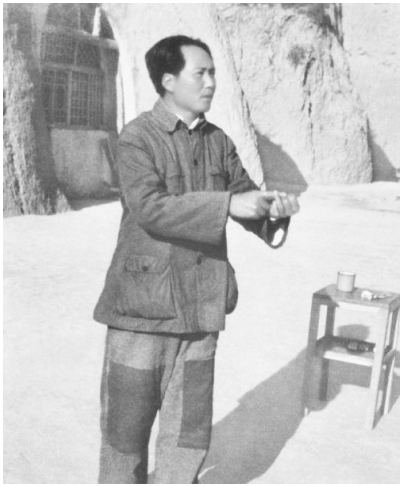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 王 涛

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在革命年代，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保障。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及其领导下人民军队由于长期处于被分割的战争环境，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针对这种统一精神不足、各自为政等不协调的现象，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九一决定”，着重强调党的一元化。毛泽东指出，“党是一切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个“最高”是领导一切形式的组织，就是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民众团体。毛泽东还强调，我们党要步伐整齐、完全统一，达到高度的一元性，使我们的党成为一条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就要求党组织善于把党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没有领导核心，事情办不好。领导核心的成员不是“机械的凑

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

——毛泽东阐述怎样使全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概括党建目标时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花了两天的时间专门系统阐述怎样使我们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毛泽东重点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倾向，指明了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必须解决好的若干问题。

合”，而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足以成为领导革命斗争的领袖。要从斗争中产生出群众的领导分子、积极活动的最先进分子。在积极分子里，要由一少部分人组成为核心，通过他们教育广大党员联系群众，“你也联系一个群众，他也联系一个群众，这就联系了广大群众，于是乎，大家进步”。

党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

建立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对于党的决议，如果“合我脾气的就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那么党的意志、党的决议案就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如果任由消极的自由主义发展下去，就会导致“闹独立性、小广播、讲价钱、调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议案、讲了不做、见了坏分子不批评、见了不好的思想不作斗争”，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就不能建立起来了。

思想是否统一关键看实际行动。党员对党的任务要自觉执行，“这个担子我不愿担，勉强强强的担负起，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纪律就建立不起来”。因此，必须使党内广大群众懂得党所提出的任务，要使党员清楚，要他有自觉性。毛泽东强调，铁的纪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发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搞纪律我们就搞纪律。纪律是在党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不是现成的东西。思想统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党内广大党员群众对于任务要有自觉性，做到了这些，就有铁的纪律，做不到这些，就像豆腐、像水一样，离铁就很远，那么铁的纪律就没有。

我们就是要新的革命作风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被人们信仰，是由于它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对于命令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主观

主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新的革命作风”。应当把党的作风放在新的革命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步调上，新的革命的精神上，拿每一个口号、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动作，使干部、使群众有新的革命作风，这样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进步，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地提高。毛泽东还强调，培育新的革命作风，必须敢于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自高自大要不得，把枕头枕得高高的睡觉，那就要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干部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个是团结，第二是有了错误要斗争，要有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糊里糊涂的团结，缺乏原则性的团结，是团结不了的。

把群众的觉悟提高一步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失去群众拥护和支持，党

就会失去根基。毛泽东指出，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毛泽东强调，群众工作有很强的原则性，党员的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一方面，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一定要穿农民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这样就可以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从而懂得群众的迫切要求，进而向群众学习、教育群众。另一方面，要联系群众但又不是跟着落后群众的尾巴走，不能变成了尾巴主义，而是要把群众的觉悟提高一步。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譬如，群众中有敬菩萨的传统，有的党员为了联系群众也去敬菩萨，但是“敬观音菩萨敬一次还可以，如果天天敬，这样就把共产党混同于老百姓一样

了，就变成了老百姓的尾巴”。正确的工作方法是“慢慢来”，做好实际工作，“把土豪打了，田地一分，菩萨就少了”，最终破除了迷信，逐渐地把群众觉悟提高到党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脱离实际的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咬文嚼字，做事时胡乱搬运公式；还有一种是不做事，只读书，读了好多“箭”不放出去，当作宝贝古董。“他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边币跌价都不能解释，这种读书是脱离现实的。这个现象不能容忍了，再不能够发展了”。必须彻底打破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问题。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向全党号召“我们要增强理论”，尤其是高级干部，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恐怕我们就要大大地提高了。

以史为鉴

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 贺 莉

实现多方参与的共建共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近年来上海、宁波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这些创新实践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通过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将党的领导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为基层治理和基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也为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平台。

探索民情民意上达机制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一些公共问题只有以一定的形式、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政策程序形成特定的政策，最终使这一问题通过政策途径得到解决和处理。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个自下而上之后又自上而下的反复沟通、实践、修正的过程，将群众的意见、要求、利益反映到党的各项决策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经验——群众路线。

从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来看，这些创新实践在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走出机关、走向社区、走向最基层的群众，把党的建设阵地从党内拓展到党外。比如，一些地方组团式集结各界精英，通过直接、面对面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形成决策依据，从而改进工作，并形成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度。还有一些地方开展“同心家园”建设，以居委会为主导，通过“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强化居民参与小区建设管理的意识和责任，营造基层民主协商和居民参与自治的良好氛围。这些创新项目是党组织牵头的收集民意、反映民意的集体行动，拓宽了政党和政府收集民意的渠道。通过对民情民意的收集，形成动态民情信息库，通过对群众反映问题的跟踪、反馈为政府决策的调整提供借鉴，打通了政策制定自下而上的通道，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

大城市不同空间区域的群众具有不同的公共需求和利益诉求，群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是量大面广，而是要满足自身需求；只有与群众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才是高质量的、精准的。而在现实中，当一项公共服务和产品必须由两个以上部门提供时，而且公共服务的多部门提供成为常态时，如果缺乏必要的基于协调、合作、共享理念的集体行动，那么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有可能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步下沉，基层治理组织被激活，更多的公共服务触角深入到社区、家庭以及居民。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到基层区域性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中，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网络逐渐下移至群众身边的“琐事”，公共服务网络的下移以及公共部门职能的下沉使得城市精细化管理成为可能。

新近出现的社会建设创新项目能够回应基层群众的期盼和诉求，使群众具有更强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比如，商铺将自有车位夜间向周边居民开放、相邻小区打通院墙协同停车等，大大提高了公共停车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比如，依据老人们的需求组织书法、插花、编织、唱歌、舞蹈、腰鼓、风琴、桥牌等各类群众团队，丰富了居民区老人的生活。党员与小区高龄独居老人一对一结对的活动，使这些独居老人能够享受到24小时随叫随到的贴心服务。这些创新实践以党内资源引领带动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整合，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公共服务的总量，尽可能依据不同居民群众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公共服务，提高了公共服务提供的精准度。

完善区域化党建平台

一些城市提出通过协调、整合、信任三大治理机制，消除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更好地将相关利益部门整合在一起以便产生协同效应，实现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整体性行动。与“整体性”相对应的是“扁平化”。政府管理的扁平化强调多方的合作与参与，聚焦于政府体系内部的结构与流程调整，如减少行政层级、提高效率等。政府管理的扁平化具有管理成本相对低廉、侧重于少层级近距离管理、强调协商与协调等特点。

『互联网+党内监督』的政治优势

□ 于 江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应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互联网+党内监督”模式是确保全面从严治党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具有重要的政治优势。

提高党内监督的公开化

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网络监督方式，可以通过对权力运行各个环节的监督，使得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严格的党内监督就延伸到哪里。在权力赋予环节，通过对干部信息和任免情况进行网络公示，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信息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进行严密监督，有效纠正了选人用人环节上的不正之风，实现党员干部任用流程的公开和透明。在权力履行环节，通过网络公示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让社会公众知晓权力行使主体的“为”与“不为”，明晰权力边界，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也能够时刻提醒权力行使主体必须依法行政。在权力考核环节，信息化监督手段的广泛运用，强化了党内问责机制，让数据“说话”，减少人为的主观臆断，使党员干部的绩效考评方式更加科学、合理和公正，提高了党员干部“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营造党员干部“专心谋事、踏实干事、清廉成事”的政治氛围。

推进党内监督的互动化

党章及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要求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互联网相对于其他媒体的最大优势就是“互动化”，这既能为各利益主体及时表达利益诉求，又便于及时提出监督意见，实现党内监督参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以互动化推进党内监督的民主化。目前，党内监督主要局限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专门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模式的缺陷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督，导致监

督缺少“互动性”。而真正应该发挥监督主体作用的广大普通党员却“角色缺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员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与权利，但在实践中党员参与党内监督还存在不少障碍。互联网的出现恰能弥补这种缺陷，实现监督的“全覆盖、全方位、全天候”，以互联网“征集”更多的“监督人”，构筑起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机制，从深层次改变民众参与监督的方式。“互联网+”最为重要的就是思维变革，其开放、平等、透明等特性契合了党内监督的时代要求，那就是更加注重信息透明和党员参与表达，让党员主人翁地位得以体现，让党员们在APP、微博、微信等党建网络平台上充分参与，保障其民主参与权利的实现。

拓宽党内监督的新空间

“互联网+党内监督”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其借助互联网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互联网与党内监督的有机整合，发挥技术要素推动党内监督新提升的强大动能，从而拓展党内监督的新空间。一是通过互联网对党员干部个人财产的监督。凭借互联网技术，党员干部个人财产情况将变得更加透明，更容易为纪委和组织部门所掌握，这显然有利于准确地抽查核实领导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有利于对官员贪腐情况的调查。二是通过互联网对党员干部履行义务的监督。在国内一些地方，正探索尝试为每位党员配发“党员工作智能卡”，将党员干部参加组织生活、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以及履行交纳党费等义务的情况，被技术手段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进而使得党组织考察党员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是否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都有可靠的数据说话和作证。三是互联网对于党员干部违反社会公德情况的监督。当前，依托互联网技术已经实现了广大民众在商业贷款、乘坐飞机火车、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诚信记录，将这些数据进行适当的数据整理和汇总，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党的监督部门就可以更加准确地考察党员干部在“德”方面的具体表现情况。

党建视角

改革与创新